

论海明威的小说悲剧

杨仁敬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海明威作为一个悲剧小说家,这一身份不论是从以往论者的评价中,还是从其自身的作品中,都可以得到确认。从荷马时代至今,悲剧形式不断有变化,悲剧因素成了一种观察历史的方法。海明威的小说悲剧大体可分为五类:身心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伤残或亲人死亡的悲剧,受到厄运打击的悲剧,大萧条背景下民不聊生、铤而走险的悲剧,为正义事业献身的悲剧,与大自然顽强拼搏失败的悲剧。海明威的小说悲剧写的都是现代西方社会中普通人遭遇的不幸,这与他的悲剧意识的发展变化是分不开的。其悲剧意识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对大萧条现实的反思,对世界危机的思考,以及对战后重建时期的期待。海明威从古典悲剧里吸取了有益的东西,融入自己创新的元素,创作了从内容到形式焕然一新的现代悲剧,在这个意义上说,他开创了美国的新现代悲剧。

关键词:海明威;小说悲剧;现代悲剧

中图分类号: I7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2012)01-0078-08

1952年,美国著名学者卡洛斯·贝克指出“从《太阳照常升起》以来,海明威所有长篇小说都是悲剧。”^[1]同年,菲力普·扬说,《老人与海》的伟大成就是作为一种希腊模式的悲剧。他觉得作者的主人公像作者一样,在身心受到严重的创伤以后想追求得到全部。主人公在大灾难的打击后,追寻妥协与和谐。^[2]这种追求与作者的悲剧设计是平衡的、息息相关的。当时许多学者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海明威是个悲剧小说的创作者。

海明威本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表了态。1927年,他写了《华伦丁》给一些攻击他的批评家,用一句引文“可怜的小灾难,对命运洗牌作弊”来嘲笑他们。在他看来,世界是个悲剧,“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悲剧。”不久,他宣布《太阳照常升起》是一部该死的悲剧,主人公像地球一样将永存。后来,他又称《永别了,武器》中的主人公亨利和凯瑟琳是他的“罗密欧和朱丽叶”。^[3]显然,海明威是个悲剧小说家。如何界定他这个身份呢?我认为应从作品文本的分析入手来解读和探讨。

一、现代悲剧的内涵和意义

古往今来,悲剧一直是个重要的文学体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许多批评家一直关注悲剧的

收稿日期:2011-09-20

基金项目:中国社科院重点项目“外国名作家学术史研究”分课题“海明威学术史研究”(YzdA2006-3)

作者简介:杨仁敬,男,福建晋江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哲学性,它最终的情感上与认识上的交流。他们认为在一部悲剧里,主人公与外部的灾难搏斗,精神上获得了胜利,最终遭到失败或毁灭,揭示了与悲剧主题不可分割的崇高思想。悲剧的意义在于它赞扬人对命运的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悲剧主人公通过他遭受的灾难,与社会的不公正抗争,以最后失败或死亡与现实世界妥协。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悲剧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尽管有些差异,最后总是殊途同归,形成同样的结局。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主人公“致命的缺陷”造成的,即一种行为或一种品德给他自己带来的灾难。换言之,这种悲剧是主人公自己一手造成的。^[4]他的严重行为是特别关键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和《奥赛罗》基本上属于这类悲剧。黑格尔的悲剧论,受到学术界广泛重视。在他看来,悲剧是两种道德上的极端或人类生存状态之间的冲突。人物或某种力量之间与其相反或对立的品德之间的冲突。^[5]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里,作为伊狄帕斯和约卡斯塔的女儿,安提戈涅蔑视叔叔克列旺,为哥哥的遗体举行了哀悼仪式。他对家庭的忠诚与叔叔对国家的忠诚发生了冲突,结果造成了可以预见的悲剧。^[6]尼采对悲剧的看法与黑格尔是一样的。他认为希腊神话表现了具有批判理性的力量与表现独创的直觉力量之间的冲突。^[7]这基本上是黑格尔式冲突的一个案例。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从希腊悲剧的范例中力图从经验中引出结论。亚里士多德主要的样本是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伊狄蒲斯王》,而黑格尔的样本是同一个伟大诗人的《安提戈涅》。^[8]另一种悲剧是 A. C. 布列德利在论黑格尔的论文里提到的内心分裂和做出选择的悲剧。如上述所说的,女主人公安提戈涅自己可能是忠于家庭与忠于国家之间,在她内心产生冲突。她必须在这种冲突中做出悲剧性的选择。现代戏剧家阿瑟·米勒则以为悲剧性的灾难是个人反抗社会,决定打破自己不可打破的性格造成的。他的剧作《坩埚》就是他这种理论的实践。崇高的个人道德变成一种实际的、起作用的缺陷,最后成了致命的缺陷。^[9]

总的来看,一方面悲剧是命运决定的。它揭示了人在反抗命运的摆布中孤立无援,另一方面,悲剧又取决于人自身,显示了他是他自己失败或毁灭的最后作者。一部悲剧可能只体现了一种极端或另一种极端,而大部分悲剧则二者都体现。新批评派的代表克林思·布鲁克斯则持相反的观点。他说,“对悲剧英雄来说,苦难绝不是强加的,那是他自己的决定招来的。”^[10]悲剧主人公要承受巨大的灾难。这种灾难是无法逆转或补偿的。同时,承受灾难要有充分的动力,才能有力地推动他的感情采取行动对付灾难。也许他能从物质上和体力上从失败中崛起,但这种人不太多。多数是外表上失败了,但精神上取得了胜利。这种对灾难的超越可以达到更高的认知,并与现实世界或社会生活妥协。超越和妥协是那些“最崇高的悲剧”的重要因素,但不是一切悲剧不可缺少的。无法挽救的灾难则是悲剧里常见的。

现代有没有悲剧呢?当然有。有些学者认为从荷马时代至今,悲剧形式不断有变化,悲剧因素成了一种观察历史的方法。这在西方世界一直保持下来,没有多少改变,所以必须区分悲剧的不同形式,才能理解其含意和影响。^[11]

20 世纪 20 年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的动荡时期。新旧思想交替、冲突和整合,使美国人思想有点乱。一方面是歌舞升平的爵士乐时代,另一方面是宣传个人奋斗,中小企业家崛起的时期。许多文学名著反映了这个时期的社会变化和特点。长篇小说中的悲剧性结局屡见不鲜。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的主人公盖茨比靠走私发了财,迁居长岛富人区。他想恢复旧梦,与达茜重归于好,结果死于非命,酿成悲剧。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嚣与骚动》(1929)如作者自己所说的,是“两个堕落的女人凯蒂和她的女儿的一出悲剧”。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的第三部《赚大钱》写了 20 年代美国社会政治上的分裂、经济上的粘合和感情上的挫伤、政府不顾人民反对,处死了萨柯和万塞蒂。20 年代的美国成了悲剧的时代。时代的悲剧层出不穷,发人深思。这就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悲剧,即现代悲剧。它与文学史上的悲剧传统是不同的。如德莱塞的

《美国悲剧》(1925)。它成了一部典型的社会悲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思想内涵。

诚如上面所述,过去的悲剧大都以帝王将相为主人公,交织着英雄与美女的故事。由于道德上的缺陷如嫉妒、猜疑、犹豫和贪婪或命运的作弄而铸成生离死别或惨遭横祸的悲剧。这类悲剧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可以让人们认识历史变革的过程,吸取某些难以避免的教训。但它离现代读者比较远。德莱塞笔下的主人公克莱德·格里菲斯是个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他天真地以为找个有钱的老婆,就能往上爬,成为有名有钱有势的“超人”,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但他故意溺死多年的工人女友罗伯塔,最后被处以电刑。他的悲剧成了“美国梦”幻灭的悲剧。^[12]《美国悲剧》揭示了现代悲剧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凝重的审美价值。

二、海明威小说悲剧的类型和特色

海明威的第一部作品《在我们的时代》(纽约版)悲剧并不十分明显。因为作者还没有完全将生活看成一种悲剧。这些短篇小说里的主人公大多面临着极强大的外部世界。他们承受了不可逆转的灾难,许多人达到了精神上的另一种超越。他们在密歇根、芝加哥、意大利和近东等地受到了不同的打击。所以,除了个别篇以外,大多具有悲剧色彩。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作家从不明朗的自我画像走向个人高度的悲剧想象。当时海明威处于习艺阶段。此后,随着他小说创作的日益成熟,他的小说悲剧逐渐成型,并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大体可分为五种类型。

第一类是身心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伤残或亲人死亡的悲剧,如《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

许多批评家并不认为《太阳照常升起》是一部悲剧。有的说它是个道德剧,有的以为它是一个当代“荒原”的寓言,有的把它当为萨特式的存在主义设计,等等。在一段长时间内,唯一认为《太阳照常升起》是一部悲剧的是作者自己。海明威甚至令人吃惊地将主人公的身份与地球相提并论,更引起一些人的怀疑。不过,对那些有类似悲剧经历的人来说,他们认为这是海明威悲剧想象的首次披露,值得引起重视。然而,学术界仍有不同的看法。卡洛斯·贝克早就指出:海明威所有小说都属于伟大的小说悲剧,但《太阳照常升起》是一个例外。^[13]菲力普·扬将此书当成海明威的《荒原》,看到书中一些人物的真正优点,如杰克应对他的创伤,在“被破坏的地方”坚强起来;他是海明威的原型英雄,他克服了灾难,达到了完美;他从灾难的废墟中心站起来,并取得了精神上的胜利。这就是悲剧的超越。贝克也认为杰克“不是迷惘,而是残废”;作者对杰克的描写是锐利有力的,他成了全书的核心;在小说结尾,杰克表现出处于荒芜而衰弱的背景下坚定的力量,成了小说有力的道德支撑。^[14]马克·斯皮尔卡感到这部小说具有悲剧的可能性,但它的主人公从没达到,杰克的最后结局是可悲的。^[15]约翰·基宁格估计这部作品是早期一部有力的存在主义寓言,也许可以接受为悲剧,但他不会说出来。所以,海明威的意见是正确的,坚持认为这部作品是小说悲剧或高层次的悲剧是从外观来判断的。

不过,如果说它是个悲剧,那肯定是不太规则的。作者细心地描述生活环境,但没有“大于生活”的揭示。有些人不同意主人公的悲剧身份,认为小说主人公是集体的,这是不无道理的。那些人聚集于巴黎,带着感情到潘普洛纳游览然后各自东西。外表上这与他们以前并无太大差别,但认真考虑一下,杰克还是小说的主人公和智商中心的人物,对那些人而言,他也是个悲剧英雄。他的故事贯串小说的始终。他是一次大战的幸存者,严重受伤,不能过正常人的婚姻生活。大战是人间最大的灾难。杰克劫后余生,尽力想面对生活。在布列特走进他的生活前,他成功地留在巴黎从事报刊编辑工作;布列特第二次回到他身边,他感情上屈服了。他几乎是个受环境压制的原型英雄,他的悲剧不是他个人“致命的缺陷”造成的。杰克是战时在意大利飞行受的伤,战后他让自己

爱上布列特,这带有一些浪漫情调。所以,作为一个悲剧英雄,杰克承受了灾难,既是战争对他敌视的结果,又是他自己品德所造成的。杰克与布列特在马德里聚会的场景比小说结局含意更多。它肯定了两人精神上的胜利,尤其是杰克心理上的胜利。最后,他俩一起乘的士服从了交通警察指挥棒的指挥,似乎暗示了悲剧的主题:在一个冷漠而害人的世界专制独裁下,人是孤立无援的,他只能接受无法逃脱的灾难,以保持自己的尊严。

除个别人物外,小说中次要人物如柯恩、康贝尔等也像杰克一样,都是被战争搞得失去青春、失去生活方向的悲剧人物。海明威完成了他的第一次悲剧构思。他对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大千世界冷漠而充满敌意的势力所毁灭的观念后来有所发展,给予他的人物狭小的超越空间,保持一定的尊严。在往后的小说中,他给了他们更有力的回应。

作为一部小说悲剧,《永别了,武器》与《太阳照常升起》有明显不同。它不那么复杂,结构比较集中,悲剧设计比较清晰。形象比较具体严实,文字富有诗意。海明威运用了许多艺术策略,但文本里没有超越和妥协。有两个细节很引人注目:无数蚂蚁在一根营火木头上被烧死;亨利在雨中孤独地走出医院。这两个细节隐含了深刻的意义。小说的结局只能是灾难征服了一对年轻的恋人:凯瑟琳难产死了,留下一无所有的亨利在冷漠的世界上。海明威强调的中心似乎从个人超越灾难,转向接受那世界上无法逃避的灾难。小说表明没有精神上的胜利,没有超越灾难也可以成为一部有魅力的悲剧。

海明威曾称《永别了,武器》是“我的罗密欧和朱丽叶”。其实不然。如果从浪漫的爱情悲剧来看,它更像英国大诗人乔叟的诗剧《特鲁洛伊罗斯和克雷西达》,浪漫的爱情悲剧发生在大战的后方,不是在家庭纷争之间。男女主角的接触靠的是宽厚世故的朋友,表现了怀疑主义的态度。克雷西达是个寡妇,凯瑟琳是个处女;两人都在战争中失去了男人或男友,感情上想找个新的男人。爱情与战争的冲突造成了灾难。乔叟直接猛烈抨击命运玩弄他人物的命运,海明威则象征性地控告同样干坏事的西方世界。但两部作品的结局截然不同。在海明威笔下,女主人公凯瑟琳的死造成了男主人公亨利悲剧性的冲动,她被毁灭了,亨利虽生犹死。对他来说,没有妥协,也没有超越,那成了他最后的灾难。他第一次自己选择从美国到意大利参战,思想是迷迷糊糊,说不清什么的,第二次受伤康复后又积极上前线,第三次选择了从战场开小差,宣布“我已忘记战争,与战争单独媾和”了。事实上与残酷的战争“单独媾和”不可能,战争仍在进行,环境依旧险恶。他还可能受到惩罚。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改变人遭受冷酷的社会造成的毁灭,这是海明威对悲剧认识的变化。

第二类是受到厄运打击的悲剧,如《过河入林》和《湾流中的岛屿》。

作为一部小说悲剧,《过河入林》与《太阳照常升起》有许多类似之处。主人公坎特威尔上将与杰克似乎都在灾难面前必须做出抉择和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坎特威尔在二次大战中是个将军,后来与上司不和被降为上校。退伍后,他患上心脏病,两次发作几乎要了他的命。他认为自己在人世不久了。这是不可避免的,这对他是个大灾难。他找了一个意大利贵族少妇雷娜塔,向她倾吐心声,发泄不满,以平静的心态与疾病作斗争。他也去野外打野鸭,呼吸新鲜空气,与命运搏斗。他面对死亡的来临既不害怕也不遗憾,将死亡当为必然的归宿,获得心灵上的自我安慰。他受过误解和惩罚,他泰然处之,与命运周旋,临死不惧,视死如归。在他打野鸭归来返回威尼斯的路上,第三次心脏病发作,夺去了他的性命。厄运和灾难以及他个人的缺陷铸成了他的悲剧。

《湾流中的岛屿》男主人公托马斯·哈德孙画家一生坎坷,经过两次婚变,始终仍孤身一人。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二次大战中去英国空军当兵,在一次执行飞行任务中牺牲,其他两个儿子到比美尼岛与他团聚,回去后竟发生车祸双双遇难。厄运的接连打击没有毁灭他。他振作起来,组织一些志愿人员,驾着他的游艇,在古巴北部沿海跟踪德国潜艇,顽强地与敌人周旋,最后在一次追捕纳粹潜艇残余分子的战斗中牺牲了。临死前,他看到了在悲剧妥协中世界最后的和谐。

第三类是大萧条背景下民不聊生、铤而走险的悲剧,如《有钱人和没钱人》。

这部长篇小说与海明威早期两部长篇小说不同,更像一般的现代悲剧,有学者称它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悲剧。^[16]它比起前两部小说来说具有更多的视觉形象,同时又偶尔展示一些抽象的思想。《有钱人和没钱人》直接揭示了悲剧是主人公哈里·摩根“致命的弱点”造成的,这对海明威来说还是第一次。

哈里·摩根在为生存的斗争中是注定要失败的。他是基韦斯特一个普通工人,美国大萧条危机袭来,他失业了,家庭生活陷入困境。他的灾难包括政治的冲击和经济剥削。他受到一个商人的欺诈,又被一个政府官员欺压。这使他的悲剧具有政治色彩。摩根有条船,又有妻子和两个小孩。他靠那条船维持一家的生活。他想靠自己老老实实的劳动挣钱养家,这是他的最大愿望。可是灾难悄悄地降临到他身上,命运逼他做出错误的选择而走向灭亡。约翰孙先生粗暴地欺诈他,租用他的船十九天,然后坐飞机从哈瓦那溜走,欠了摩根825美元。这迫使他第一次作出选择:让他家人挨饿,子女失学,还是接受危险而非法的差事呢?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家人的生活,维护自己的尊严,他选择了亡命之徒的职业,走上违法之路。这是他致命的选择。大萧条危机又逼使摩根不再靠捕鱼谋生,他开始走私烈酒,并不断做违法的事。故事的最后,他遭遇海岸警卫队,被打伤后躺在甲板上喘着气说,“单独一个人是搞不到血腥机会的。”他临死前才懂得了他战胜不了欺压他的势力。他的悲剧是命运与他自己的盲目自信一起造成的。

尽管批评界认为这部小说艺术上是败笔之作,但它提供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的现实直觉视野,人物真实可信,悲剧结构有力,语言节奏感强,富有活力。小说揭示了美国社会生活中贫富的悬殊和不公。这是经济危机中社会制度的不良运转造成的,它给下层平民百姓造成了个人悲剧。所以摩根的悲剧既是个个人悲剧,也是个社会悲剧。

第四种是为正义事业献身的悲剧,如《丧钟为谁而鸣》。

如果说摩根的死亡得到了精神上胜利,那是有限的,痛苦的,那么,《丧钟为谁而鸣》主人公罗伯特·乔登以坚强的意志和果敢的行动获得了精神上的胜利则是毫不含糊的,那是一种值得称赞的超越。西班牙内战是法西斯势力造成的一场大灾难,远在美国的乔登主动挑战它,与西班牙民众一道与这场灾难搏斗,最后牺牲在西班牙土地上,进步力量也失败了。乔登虽死犹生,令许多读者感动不已,称赞他的死是最幸福的。他的悲剧是一种层次最高的悲剧。

乔登对灾难的回应是积极主动的,很有力度,他经历了四次选择。第一次,作为一个大学讲师,他可以待在蒙塔那大学,继续努力教书,将来成为专家教授,功成名就,生活优裕。但他选择了投笔从戎,到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斗。第二次,到达西班牙后,乔登接受了国际纵队司令高尔兹的命令,到山区游击队驻地,组织他们炸桥,切断敌人退路,他深知这是个危险的任务,但他高兴地接受了。第三次,乔登在游击队山洞,与西班牙少女玛丽娅热恋了三天,出现了爱情与任务的矛盾。他从没想过带着玛丽娅逃离战场,到遥远的地方过着平静而甜蜜的生活。对他一个外国人来说,当时这么做并不太难。但他选择了坚守阵地,完成炸桥任务。在执行任务中,他遇到自私的游击队长巴布洛擅自出走;他在彼拉帮助下,说服了巴布洛支持炸桥。这是他正确的判断和策略。当时法西斯势力是灾难的根源,乔登要战胜这场灾难,唯有团结全体游击队员共同对敌,才有希望。这反映了海明威对于抗击灾难求生存的新认识。第四次,炸桥后,游击队迅速撤退时遭遇了敌人,乔登的腿被打断了。他有机会在其他游击队员的帮助下安全地撤离阵地,但他选择了留在阵地,用机关枪掩护他的游击队队友们安全撤退。最后,他壮烈地牺牲了。这个选择是一种真正的无私的选择,也是一种超越爱情、超越自我的选择。有些批评家认为这部悲剧小说有些像历史上有名的“英雄悲剧”,它体现了海明威的最高艺术成就。

乔登的四次选择造就了他的英雄形象,这不是偶然的。他与亨利不同,他对西班牙内战的认识

是清楚的。他的选择是他经过内心思想斗争的结果,他的超越是自觉的。诚如他所说的,“现在,我已经为我所信仰的东西战斗了一年。假如我们在这里打赢,我们一定能处处打赢。世界是个美好地方,值得为之奋斗。我多么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啊。他对自己说,你有很多好运,度过了这么美好的一生……因为最后这几天来,你像任何人一样,过着这么美好的生活。我希望有什么办法将我学到的东西告诉后人……我很想跟卡柯夫聊聊。”^[17]乔登的内心独白成了小说主题很好的解读。海明威以炸桥为中心的严密结构集中体现了主题。他引用 17 世纪英国诗人堂恩的诗文成了小说最好的注脚:一个人的主要任务是尽其所能为全人类的自由和尊严贡献一切,包括生命。为了人类整体,牺牲自己是个人的义务。如果说死是个悲剧,那么乔登的悲剧是闪亮的悲剧,他的献身是个最伟大的超越。这说明海明威的悲剧意识进一步强化了,他不再单纯追求个人劫难后的余生,而是关注人类的命运,从全人类的得失来考虑个人的生死。

第五种悲剧是与大自然顽强拼搏失败的悲剧,如《老人与海》。

小说主人公圣地亚哥是个古巴老渔民。他有丰富的捕鱼知识和经验,但他一贫如洗,无依无靠,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回报,世界对他太不公平了。当他遇到意外困难,84 天捕不到鱼时,周围的人怪他倒霉,连他身边的小男孩曼诺林也给父亲拉走了,他们以为老人交上厄运,不能与他为伍。他的环境对他太冷淡了。不仅如此,作为一个渔民,圣地亚哥经常会遇到狂风恶浪,风里来雨里去,小船颠簸,巨鲨出没,风险很大,比在岸上打工要危险得多。他与大自然的冲突,经常处于劣势,很难有几分胜算。但是,圣地亚哥充满了自信、乐观和必胜的观念。84 天捕不到鱼并不能让他畏缩和退却。他认为“人生来不是被打败的。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他选择了再出远海,虽然孤立无援,但他信心十足,愤然前行。他主动挑战大自然,挑战社会,想超越所有的人,甚至全世界的人。他知道出海的风险和社会的冷淡,想过不该当个渔民,但他认识到他生来就是个渔民,别无选择。后来,他出了远海,果然捕到一条大马林鱼。他耐心地跟它周旋,表现了“一个人所能做的一切”,在海上顽强搏斗,第一轮钓住了大马林鱼,他胜利了,没料到第二轮被鲨鱼打败了。他精疲力竭,回到家里就躺下睡着了,梦见非洲的狮子……不难猜测,他还会再出海捕鱼。他是个打不败的人,获得了精神上的胜利。他那质朴、粗犷而顽强的高尚品格给予读者崇高的审美情趣。像乔登一样,他展示了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在大自然和社会造成的风险面前毫不畏缩,主动迎战。虽然他没有像乔登那样壮烈牺牲,而是遭遇了悲剧性的失败,但他选择了挑战失败,战胜失败,虽败犹胜。像乔登一样,他是个海明威式的悲剧英雄。

三、小说悲剧与海明威的悲剧意识

从上面的评述可以看出,海明威的小说悲剧写的都是现代西方社会中普通人遭遇的不幸。他的悲剧主人公杰克、布列特、亨利、凯瑟琳、摩根、乔登、圣地亚哥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海明威以独特的艺术技巧和简洁的语言,描绘了他们的人生悲剧,揭示了他们的内心感受,为现代小说悲剧增添了新的一页。海明威的小说悲剧与他的悲剧意识的发展变化是分不开的。从他的创作来看,他的悲剧意识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海明威亲自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阵地上受了重伤。菲力普·扬曾以此创立了“创伤论”,认为创伤成了海明威所有作品的基调。海明威对此加以否认。但海明威说过,“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悲剧。”他寄居巴黎期间,曾被派往洛桑、热那亚、伊斯坦布尔、鲁尔等地采访,了解了欧洲许多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问题,尤其是希腊土耳其战争中难民逃亡的惨状、法国占领德国鲁尔区后马克贬值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困境以及法西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崛起给欧洲和平造成的威胁。这一切混乱的局面都使他感到生活就是一场悲剧,平民百姓要

生存不容易。所以,当菲茨杰拉德建议他写一部长篇小说来促销他的短篇小说时,他立即想到了采用他一次大战的经历作为小说题材。他先后写了《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两部长篇小说,迅速地从文坛崛起。

《太阳照常升起》标志着海明威悲剧意识的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一群英美青年留下了身心永恒的创伤。男主人公杰克在战争中生殖器受伤,与女主人公布列特相爱而不能成家。布列特的未婚夫死于战场,她成了“寡妇”。其他青年浪迹于咖啡馆和夜总会,看斗牛或去捕鱼,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他们之间有过争吵和嫉妒,但彼此关照,似乎“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永别了,武器》男主人公亨利稀里糊涂地到意大利打仗,没料到大溃退时被疑为外国间谍,差点被打死,他急忙跳河逃走。后来,凯瑟琳难产而死,铸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亨利与战争“单独媾和”却仍无法逃避命运的惩罚。这两部小说悲剧与古典悲剧相比,气氛比较平淡、自然,没有那么紧张和暴烈,更没有发生暴力谋杀、凶杀或自杀。海明威以平静的心态描写一幅幅人生悲剧图。第一次世界大战像个无形的杀手,主宰了欧美一代青年的命运。它是一切灾难的根源,加上腐败的西方社会,更使纯真而受害的青年痛感走投无路,人生如梦。海明威以自己的经历探讨了悲剧的产生和表现,首次获得了成功。他那不动声色的冷眼旁观的态度使他的悲剧人物更有特色。

第二阶段是对大萧条现实的细察。20世纪30年代前后,海明威与第二任妻子葆琳住在基韦斯特多年,亲眼看到了当地受大萧条经济危机的影响: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走私猖獗,民众生活困苦等等。他写了长篇小说《有钱人和没钱人》,主人公哈里·摩根为维持家人生活,非法走私烈酒,帮助华人偷渡,最后被打死。海明威的悲剧意识在此有了明显的发展,他继续关注大萧条灾难带给平民百姓的痛苦。但摩根不再像亨利那样采取逃避的态度或像杰克那样无所谓,听之任之混日子,而是站起来对抗商人的剥削和官员的欺压,结果他孤立无援,被海岸警卫队开枪击毙。临死前,他终于认识到“光靠一个人不行……”这说明海明威自己已意识到不能屈服于社会灾难,屈服于命运,要敢于反抗。但摩根选择了不法之路,终于造成了悲剧。这个悲剧比第一阶段暴烈多了,既有残酷的面对面枪战,又有血淋淋的垂死场面。

第三阶段是对世界政治危机的思考。西班牙内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进步力量与法西斯势力在西班牙进行了首次较量。作为北美报业联盟的记者,海明威四次奔赴西班牙战地采访,亲身经历了战火的磨练。1940年他发表了《丧钟为谁而鸣》,主人公乔登为西班牙人民光荣献身,成了一位光彩夺目的悲剧英雄。海明威的悲剧意识产生了质的飞跃,在他看来,正义战争值得支持,西班牙内战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自由和尊严,反法西斯斗争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斗争,必须大力给予支援,为这个斗争而献身是光荣的。所以,他以饱满的热情表现了乔登的内心感受,高尚的情操、坚定的决心和悲壮的行为,并用常青的松树象征乔登虽死犹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可以说海明威的悲剧意识完全成熟,并创造了美国文学史上罕见的悲剧英雄人物乔登。

第四阶段是对战后重建时期的期待。二次大战后,战火消失,风雨犹存,世界仍不平静。不久,冷战爆发,美国国内“恐共症”盛行,麦卡锡主义横行,人民又受欺压。海明威战后寄居古巴一隅,仍心系祖国,后来移居太阳谷。1952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老人与海》,好评如潮。书中虽没有硝烟弥漫的厮杀,也没有你死我活的冲突,只写了一个年迈的老渔民圣地亚哥单独出远海捕马林鱼的悲剧性经历,但小说字里行间倡导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即在困难、危险或死亡面前一定要顽强抗争、绝不屈服的打不败精神。

这也许是经历了大半辈子的海明威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深切体会和经验总结。有评论说在《老人与海》中悲剧气氛达到了高潮,它充分地展示了海明威悲剧意识已经发展到一个高水平的成熟阶段。《老人与海》终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真是实至名归,人心所向。

由此可见,海明威的悲剧意识将他的哲学思想、实践经验和审美艺术高度统一起来了。他崇尚

写真实,倡导冰山原则,以高度的艺术技巧刻画了栩栩如生的硬汉子形象。他从古典悲剧里吸取了有益的东西,融入自己创新的元素,创作了从内容到形式焕然一新的现代悲剧,使悲剧不仅让人们从中引以为戒,吸取教训,而且能给人以生活的力量,催人奋进,以顽强的毅力对待困难和灾难。在这个意义上说,海明威开创了美国的新现代悲剧。

注释:

- [1][13][14] Carlos Baker, *Hemingway: The Writer as Artist*, pp. 152, 96, 75-93.
- [2] Philip Young, *Ernest Hemingway: A Reconsideration*. State Colleg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129.
- [3][4][5][6][7][8][9] Wirt William, *The Tragic Art of Ernest Hemingway*,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 4, 4, 4, 4, 4-5, 4-5.
- [10] Cleanth Brooks, ed., *The Themes in Western Litera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5.
- [11] Joseph Krutch, "The Tragic Fallacy", In George Steiner, ed. *The Death of Tragedy*, London: Faber and Fable, 1965, pp. 12-13.
- [12] 杨仁敬《20世纪美国文学史》,青岛:青岛出版社,2000年,第81页。
- [15] Mark Spilka, "Hemingway and the Death of Love in *The Sun Also Rises*," In Carlos Baker, ed. *Hemingway and His Critic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1, pp. 80-90.
- [16] Gerry Brenner, "To Have and Have Not as Classical Tragedy: Reconsidering Hemingway's Neglected Novel", In Richard Astro and J. J. Brenner, ed., *Hemingway in Our Time*, Corvallis: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67.
- [17] 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程中瑞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405页。

[责任编辑:廖哲平]

On Hemingway's Fictional Tragedies

YANG Ren-j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Hemingway's identity as a tragic novelist is confirmed by former scholars in their criticism. It can also be proved in his own novels. From the Homer age to the present,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ragic form. The tragic elements turn out to be an approach to view history. Hemingway's fictional tragedies may fall into five categories: 1) the tragedy reflecting the hero or the heroine or his/her relative was wounded or killed in World War I; 2) the tragedy of the hero who is seriously attacked by Fate; 3) the tragedy of the hero who ventures to do illegal jobs and is shot to death during the bitter Depression years; 4) the tragedy of the hero who dies for the anti-Fascist cause; 5) the tragedy of the hero who suffers serious defeat in the hard struggle against nature. What Hemingway depicts in his tragic novels is the sufferings and misfortunes of the ordinary people in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I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s tragic sense that may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1) the stage of retrospection of World War I; 2) the stage of examination on the social reality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3) the stage of world economic crisis; 4) the stage of expectation during the reconstruction period. He absorbs something good from the classic tragedies and puts in his own new elements to produce a new kind of modern fictional tragedy both in form and content. In this sense, he has created the new modern American tragedy.

Key words: Hemingway, fictional tragedies, modern tragedy